

91

东蘭县那烈乡 僮族社会历史調查报告



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

1964年元月

前 言

本調查報告是我組汪明瑀（中央民族學院副教授）、郭漢才（中央民族學院學生）等同志于1958年9月前往調查編寫而成的。為了配合工作需要，最近由李千芬同志加工整理，付印出來作為參考。

由于水平有限，更由于編者沒有親身參加調查，對於材料中某些數字及情況處理，錯誤在所難免，請讀者給予批評指正。

編 者 1964年元月

目 录

壹、一般情况	(1)
一、自然环境	(1)
二、民 族	(2)
貳、經濟概况	(4)
一、农 业	(4)
二、手 工 业	(12)
三、商 业	(13)
四、副 业	(14)
五、林 业	(14)
叁、反动派的黑暗統治	(15)
肆、解放后的各項运动	(18)
伍、文教卫生	(22)
陆、生活习俗	(27)

壹、一般情况

一、自然环境

东兰县中和区所辖那烈乡是本区十五个乡之一^①，它是广西右江革命老根据地，也是右江革命领导人韦拔群烈士的故乡。

这个乡的周围山巒起伏，翠崗环抱，中有零星狭窄的小平壩，肥沃的土地，葱綠的山林，景致十分秀丽。在这一片土地上，人們鼎建廬舍，成村立寨，計共有三个片八个自然屯，即第一片的那立、那峨两屯，第二片的勉屯，第三片的廷岭、那劳、米往、板别、板拉等屯（通称东里屯）。这些屯大都位于山坡上，杂居着僮、瑤、汉三个民族，乡委会就設在那立屯。

本乡东邻巴学乡，西界巴馬瑤族自治县岸京乡，南接那伦乡，北与林乐乡交界。东西相距約5华里，南北相距約13华里，以乡委会所在地为最中心区。

乡委会的东面是那峨屯，西面是那立屯，两屯間隔一小溪，距乡委会仅半华里。它的北面与廷岭屯相距10华里，与那劳屯相距6华里，与板别屯相距4华里，与米往屯和板拉屯相距各3华里。南面祇1里便到勉屯。

这里气候温暖，春、夏两季日照時間較长，从3月到8月气温約在摄氏25°—26°，秋天气候凉爽，气温約在18°—20°之間，冬天气候寒冷，气温低至0°—6°，以12月为最冷，要穿棉衣才可禦寒。此地下霜不下雪，河流終年沒有結冰的現象。雨季多在5、6、7、8等四个月内，全年雨量相当充沛，宜于农作物生长。

境内交通素称閉塞，关山阻隔，运输极为困难。目前仍然是以羊腸小道为通路，以乡委会为中心，有一条山路通西山岸京乡，約长30华里，一条通上圩乡約10华里，一条通巴学乡3华里，一条通那伦約8华里。为了改变历来交通閉塞状况，适应山区开展各項建設事业的需要，現在正在动工修建东中公路（由县城至东里屯），在全路140公里长的工地上，处处可见民工們以“要河水讓路，要高山低头”的英雄气概劳动着，大概至年底即可通車。

山乡的物产以大米、玉米、烟叶为主，农民过去也主要是依靠这些作物收入为生。1956年在乡內发现了大量的无烟煤和鉄矿蘊藏在地下，大跃进以后，那烈乡人民发挥了革命根据地的传统精神，树立了敢想、敢说、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，曾用无烟煤炼鉄，給山区开创了炼鉄的先例。

① 中和区所辖的15个乡，即中和、上圩、林乐、鸞坡、那烈、巴学、那倫、江平、色坡、坤玉、定桃、納黑、仁仕、紅里、王里。

② 1950年以前这里分为那烈、巴学两个乡，1951年又改称那学、巴学两乡，1953年那学乡又改为巴学乡，現称那烈乡。

二、民 族

那烈乡杂居着僮、瑶、汉三个民族，他們的自称各有不同。僮人自称为“布滿”，意即村人，僮族称瑶族为“布由”，即住在山上的瑶人的意思；瑶族自称为“仲楼”，就是我們这批人的意思，称汉族为“布滾”，即外来人的意思；汉族自称为“后汉人”，称僮族为“前汉人”，意即僮人先于他們来到这里。

本地區的瑶族傳說他們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住在这一带地方，所有平壩的田地都是他們的，后来僮族的統治者势力深入这里以后，才把他們的祖先赶上山去，以后长期的住在山上，今天人們普遍傳頌的“先有瑶，后有朝”就是这样来的。本地的僮族傳說他們祖先来自山东、山西等地，来到这里后曾与瑶族作射箭比賽，誰胜就取得这一带田地，誰敗就得上高山上去住，結果瑶族敗了而跑到山上住。这里的汉族傳說他們的祖先是明末李定国部下，当李追隨桂王到云南去时，一些不願远去的人就留落下来在这里落戶，而成为今天这里的汉族，但里面也有少数是后来由川、湘等省来經商留下来的。

全乡現有306戶1,557人，其中僮族267戶1,349人（男630人，女719人），瑶族12戶68人（男30人，女38人），汉族27戶140人（男66人，女74人），（詳見下表）。在这些居民中，以黃、陈、韦三姓为大姓，人口最多，以聶、田两姓为小姓，各祇有两家人。

居住在这里的瑶、僮、汉三个民族人民，过去曾經在对共同敌人斗争中建立了血肉相連的战斗友誼，这是各族人民关系的主流。但是也应该看到，由于历史上随着階級压迫而来的民族压迫的存在，各族人民間的关系也存在不少問題。例如僮族中的地富統治階級，往往打着民族利益的招牌，欺騙本族人民，歧視和压迫瑶、汉两族人民，伪政府的一切伏役征派，如挑担、抬轎、埋葬等，向來都征瑶民負担，瑶民历来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試，汉族也被冠以李定国部下的后裔“叛民”的罪名，不准应试科举。諸此等等，民族間的隔閡与矛盾實質上是階級压迫所造成的。

正由于民族矛盾是階級矛盾的产物，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，韦拔群同志在这里树起革命大旗的时候，馬上得到西山等地的瑶族与僮汉各族人民的拥护。1929年9月4日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拟定的最低政治綱領草案內，就有四項关于瑶族政策的内容：①提高瑶民的知識教育。②瑶民在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工資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。③严禁虐待瑶民。④沒收山主的山場、土地、森林分給瑶民。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关系的增进的。

解放后，經過了剿匪反霸、減租退押、土地改革、合作化、公社化等一系列的革命运动，民族压迫的根基彻底摧垮了，出現了各族人民間的团结友好、共同劳动、共同生活、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的新风尚。例如互助互讓风气已流行，由西山移到廷岭的汉族10戶53人和移到板別屯的瑶族5戶19人，都得到照顧田地、房子、桐树、茶树等；在合作社中，瑶族社員陈依丽不会記工分，也不識字，僮族社員罗定伦就帮助他記工分，并教他識字；瑶族社員不会犁田、插秧，僮族社員罗卜凤就教他們；社內的汉族社員不会織布，瑶族不会做鞋，僮族社員都乐意帮助他們。互相帮助，互相学习，使大家共同进步。在編生产队和分工分业上，一般都做到照顧民族特点，貫徹同工同酬，得到大家的滿意。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形成和发展。附表：

那烈乡各族人口统计表

1958年9月26日

项目 屯别	户数				人数								
	总	僮	瑶	汉	僮族			瑶族			汉族		
	户	族	族	族	总数	男	女	总数	男	女	总数	男	女
那立	22	22			124	50	74						
那峨	46	46			234	108	126						
勉屯	98	98			485	236	249				53	23	30
廷岭	10			10									
那步	17	14		3	58	28	30				14	8	6
米往	28	24	4		122	57	65	18	8	10			
板别	37	21	6	10	116	53	63	38	17	21	46	19	27
板拉	48	42	2	4	210	98	112	12	5	7	27	16	11
合计	306	267	12	27	1349	630	719	68	30	38	140	66	74
%		87.23	3.94	8.82	86.7			4.36			8.93		

貳、經濟概況

一、農 業

(1) 土地与农作物

那烈乡是韦拔群烈士的故乡，是右江革命根据地之一。它与巴马瑶族自治县的西山紧紧相連。在革命低潮时期，这里的人民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迫害，曾到处逃跑避难，历时多年，使这一块紅色的土地，变成了百草丛生、鳥兽出沒的荒野。土地丢荒，生产停滞，人烟稀少，民生疾苦，国民党反动派在这块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抹煞不了的。

解放以后，党领导了这里的各族人民，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留下的残砖断壁，开山辟地，重建家园，往日死寂了的土地变成了詩山歌海，綠色的庄稼琳琅滿目，呈現了欣欣向繁的新气象。

全乡耕地面积共1,495亩。其中水田1,222亩，分成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等，多分布在小河两岸，灌溉方便，一年可种三造禾苗；畲地有273亩，多分布在山坡岭頂，地質較差，一般只能耕作三、五年就得另开生荒，进行輪作。过去在反动統治年代里，好田好地多为地主富农占有，大片的荒山也多是山主控制，农民被束縛了手脚，山区优越的自然条件沒有得到充分发挥，灾荒連年发生，受苦的自然都是穷人了。

历来人們习惯上不以亩、分为土地面积計算单位，而是以一稽种子(約等于12两)播种的多少作为計算土地面积单位，一般約七稽种子等于一亩，土改以后才逐渐改以亩为計算单位。

本乡农作物种类較少，計有粳谷(分紅粳、青粳、黑粳)、糯谷(有八月糯、粘糯、大糯)两种稻谷。这些谷必須种植在肥沃的田里，經常有水灌溉，解放前亩产約300—400斤左右，解放后經过了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，农业生产大大解放，稻谷亩产达500—600斤左右。还有一种叫粘谷(分旱粘、油粘两种)，多种在較瘦瘠的田中，过去亩产是200—300斤，1956年亩产达400斤左右。再有一种旱谷，多种在畲地上，据說1930年革命遭到失敗逃荒到河池时带回来的，因种在旱地上，逢干旱則收入很少，一般年成仅收50—100斤。

上面所說的这些稻谷品种据說是在清代咸同年間由外面传进来的，但这种說法恐怕有不确切之处，因为很久以前这里已有人生活，难道他們都不种田地嗎？

玉米也是本地主要粮食之一，分早、中、晚三造。据說早造在清光緒末年由田州运来，起初种在菜园里，数量不多，元月种四月收；中造种在畲地里，四、五月种，七、八月收；晚造是解放后由靖西运来传种的，七、八月种，九、十月收。解放前单位面积产量，早玉米150—200斤，中玉米300斤。解放后由于加工加肥，早玉米亩产达350斤，中玉米达400斤，品种种植逐年也有变化，如表上所列：

年 代	1952年		1953年		1954年		1955年		1956年		1957年		1958年	
造 別	早	中	早	中	早	中	早	中	早	中	早	中	早	中
亩 数	340	125	320	314	368	314	422	296	463	285	468	284	588	273

从表中来看，中玉米到1954年后逐年下降，早玉米则逐年上升。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开荒地种两年后就停歇，而有的间种上油桐树，树大后就不能再种了，同时还用些力量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。

稻谷在解放前只种单造，解放后从外地学来了经验，1954年开始由南宁换来早造种子，逐年推广。晚造是由1955年开始种植。1957年由于台风吹起来，早造和晚造都缩减了，今年才恢复起来。

木薯是1956年开始种植，过去种的不多。小麦过去很少，1955年才逐步推广。

此外，本地还有黄豆、猫豆、鸭脚粟、饭豆、红薯、南瓜、三角麦、芋头等杂粮，经济作物有桐油、蓝靛、棉花等种，其中尤以桐油出产为大宗，几乎满山遍野都有桐树林，桐油收入在人们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。

(2) 生产力

劳动分工：解放前，这里的男女两性在分工上是很明显的。犁田耙地、挑担插秧、打柴修屋等重活，全由男人负担，连妇女拔得的秧苗、割的谷穗也是由男人挑回家的。妇女除拔秧割谷、护种棉花蓝靛之外，多干洗衣、煮饭、缝衣、做鞋、纺纱织布、照料小孩等家务工作，即使是缺男劳动力的家，也祇是请人帮助耕犁和插秧，妇女会犁耙插秧的很少。解放以后，这种不利于生产的分工才逐渐被打破，1951年就有许多妇女去开荒，1955年初级社成立时个别妇女也学会了犁耙插秧，如一队黄秋梅，二队黄也论就是先例，初学耕田时虽受到一些男人的冷笑，可是新的东西终将出现，到1956—1957年间，妇女参加田间的耕犁插秧工作已成普遍，这一几千年来的旧规矩被打破了，妇女劳动力的解放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。

过去，这里一家一户是个生产单位，自由散漫，常误农时，虽然也有一些无代价的互助习惯，但由于小农经济私有观念的局限，因而非常不牢靠。帮了人家又怕丢了自己，误了农时，这些矛盾是当时所不能解决的。

一家之中，老人与小孩也作附带劳动，看牛、放马、捡粪、喂猪鸡、养鸭等多由老人或小孩做，失去了劳动力的老人才不劳动，而小孩长到十六、七岁时便是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了。

大跃进中的生产力——大跃进中，人民思想觉悟提高了，敢说、敢想、敢干的风格，已成为全体群众的行动口号，劳动热情空前高涨。在耕作技术上进行大力改革，卫星田，试验田到处都搞得热火朝天。各地还进行互相协作，你的队没有劳动力，别的地来支援，他的队没有牛，我的队调去耕牛，使生产很快开展。

为了适应大跃进形势的需要，各屯相继建立了公共食堂，计全乡共有食堂十二个，参加户数达三百零三户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。由于食堂的建立，改变了过去一家一户，自炊自食，做饭、煮菜都得留人来负责的习惯，集体观念加强了，团结也搞得更好了。许多妇女从家务繁重工作中解放了出来，投入各项生产中去。

在大跃进中，许多家庭妇女都投入各项生产战线上去了，为了使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，使做母亲的能安心生产，因而各地也先后成立了托儿所。计全乡共成立了那烈、那峨、勉屯、东里等四个托儿所，入托儿童84人，17个教养员。这样，既使广大儿童受到集体生活的教育，也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。

生产工具——在本地生产工具大部份和外地相同，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差异，种类也比

外地少得多，鉄器工具的使用也比較少。現將本地主要的生产工具列下：

犁：式樣與外地差不多，除了犁頭是鉄制之外，其餘全是木料拼成，在本地生产上是一種重要的工具，它是在犁田地時所用。

耙：有鉄耙、木耙等種。鉄耙的式樣和外面相同，只是樣子較小，用起来也較輕便。解放前貧戶農家是用不上的，只有地主、富農及一些富裕農民才買得上，那時一般農戶多使用木耙。木耙又分兩種，一是同鉄一樣形式，用牛拉耙田；一是較輕，用人拉作打畦培土工具。現在鉄耙使用已逐步普遍。還有一種手提四齒耙，在耘田或培土時使用。

鋤頭：在這裡多用於挖山開荒。有大形和小形兩種，大鋤長約一尺、寬約五、六寸；小鋤長約六寸，寬四寸，開荒地也用上它。除此而外，還有刮子，用作平日除草培土工具。

鐮刀：有大小兩種，大則大彎而短，割禾割草都用，小則小彎面長，有鋸齒，用作割禾。還有手剪，是用一塊鉄片鑲在木塊上，再安上一個柄子，剪谷時就用它將一穗一穗的谷剪下來，工效很低。

柴刀：式樣與外地同而比較輕便，平日開山伐木多使用它。

以上這些工具，過去本地沒有專門鉄匠打制，多從河池、南丹、田陽等地運來，現在這些工具已有人會製造，而且還推行了新式步犁、中耕器、耘田器、脫粒機等，代替了過去腳踩手割的現象。

運輸工具——這裡山高嶺陡，運輸相當困難，主要的運輸工具是扁担、籬筐、布袋等，在短距離運輸中就專靠人挑、背負來進行。遠距離的運輸多用馬馱，但窮人是沒有買得起馬的，富人养的馬人不多。解放後，黨對山區的交通運輸事業給予大力幫助，現在正大力修筑公路，不久即可通汽車，山區的運輸困難將很快得到改變。

生产技术——

耕作方法：在農作物耕作技術上，人們也有了自己一套方法。從收割開始，人們就選定谷穗長的較飽滿的田由專人收割下來，捆成把，晒干後放到谷倉里，等下種季節將谷粒脫下（多用腳踩踏），據說飽滿的谷粒很容易脫粒，因而當谷粒脫落三分之二時便停止，將未踩下的留作食用。選種育秧也是新近推廣的育種方法，在育秧前先用溫水泡種，待發芽後再撒到秧田里，當秧苗長至一尺左右再拔起移插到田中。這樣作稻谷長的較好，增產較有把握。玉米也有選種的習慣，收玉米時將丰满大個的玉米個留下，剝除兩頭細小的顆粒，將中間的粒子剝下作為種子。對於其他農作物也是按照平日生產經驗進行選種。

過去，本鄉大部份田地都不翻土過多，只等到播種季節才開始翻土，馬上翻，馬上耙，馬上種成為人們的習慣。稻田一般是兩犁三耙即可插秧，犁的深度4至6寸左右，株距一般都在一尺二寸左右，人們認為這樣好耘田。旱地多採取點播辦法，如玉米，先打畦，放下水肥，然後下種，各種豆类也多採用此法。旱谷則有撒播和點播二種。麥類則多是撒播，他們有句俗話說：“肥地則撒播，瘦地則點播。”

這裡山多地少，所以一畝田地中，套種、間種情況很普遍。在一坵玉米地里同時種上紅薯、芋頭，也有在玉米出苞時套種上黃豆或其他作物的。旱地由於傾斜度太大，所以耕一兩年後就得丟荒另開新地，等到幾年後再來復開生荒種植，實行停歇輪種辦法。在山地上進行砍山燒山耕種的方法也還存在，每于播前一二月把山樹砍下，等干後用火燒光，播種時用鋤頭挖開放種，以後稍作除草就到收成。這種方法粗燥簡單，不放肥，只靠燒山時留下灰作肥料，作物收成是受到限制的。

解放以來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進，田普遍做到四犁四耙，深耕至六、七寸，地也深耕

至六寸，株距也多采用中株密植规格，单位面积产量比过去有所提高。但是要提高山区生产，在技术改革上仍有很多值得继续进行的。

季节安排——这里全年农事安排大体如下：

元月：种早玉米，于立春后十天进行；种三角麦，多在立春前后五天左右；中玉米在月底到二月初下种。

二月：对早玉米进行追肥培土，月底培土追肥中玉米；其它如黄豆、猫豆、棉花、鹧脚粟、南瓜、红薯等，也在这个时候下种。

三月：培土中玉米、种蓝靛。

四月：犁田耙田，挑粪下田，培土中玉米，收早玉米、三角麦，插秧。

五月：继续收玉米、插秧工作，培土中耕黄豆、猫豆、鹧脚粟。

六月：耘田、收中玉米，追肥中稻，收早稻，护理红薯，制作绿肥，插晚稻。

七月：作第二、三次耘田追肥工作，收鹧脚粟，护理红薯，收蓝靛，种晚玉米。

八月：收黄豆、摘棉花，种蔬菜。

九月：继续收黄豆、棉花、猫豆，种青菜，开始收中稻及红薯、芋头。

十月：种小麦、翻土、烧砖瓦、石灰等等。

十一月：继续种小麦、烧砖瓦，妇女则纺纱织布、做鞋，收晚玉米、晚稻。

十二月：犁田，开行碎土，准备春耕工作。

肥料——

这里在农业生产上，很早就知道用肥料，大体有下列几种肥料：

水粪：包括猪粪、牛粪、人粪、火灰等，现在每家均设有粪坑，种玉米、芋头都使用水粪。

干粪：牛、马、猪、羊粪，经晒干后打碎即成。

解放前对肥料不很重视，看见外面有粪很少拾，有些人宁愿向富户租牛来养要粪。解放后施肥次数增多，肥料种类也加多了，颗粒肥、细菌肥、土化肥、草木灰等。不拾粪的习惯已被打破了。象老红军陈宝根等，发挥了过去艰苦的革命精神，带头拾粪，改变了人们不拾粪的习惯。

水利——

解放前本乡没有什么水利设施，人畜饮水都到小河去挑，水塘、山泉很少，大部份田都靠下雨来灌溉。在河边一带的田则依靠水车取水灌田。

解放以来，在党领导下，水利灌溉事业有了很大发展。1956年底开始兴工修建“拔群水库”，到1958年2月竣工（中间因故曾停过工）。水库筑了三道水坝，第一道坝长16米，库内面积有二十亩宽，第二道长22米，面积五亩，第三道坝长9米，约一亩宽。库上还修了两道桥，挖了两条水沟，由东里屯至巴学乡，全长约八公里，灌溉两乡田地共千多亩，那烈乡受益面积630亩，占全乡水田一半以上。

1957年12月又在勉屯修筑“巴河水库”。这个工程从开工起经常保持有三百人在工地做工，任务紧张时曾达千人左右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至1958年5月竣工。水库深约7米，宽约28米，长约36米，蓄水量可灌溉132亩水田，改变了这一带过去严重干旱的现象。

1958年元月，还利用三面环山的自然形势，筑了一道42米长的堤堰，建筑“干上水库”，水深5米，宽3米，面积约8亩，可灌田50多亩。到三月水库已完成。

这三个水库建成后，本乡绝大部分稻田都得到了灌溉，除了尚有几十亩地势高仍赖天下

雨吃飯外，其余絕大部份都成了飽水田，过去干旱的現象基本解除了，田地耕种利用率也随之增加了。

自然灾害——

这里的自然灾害旱灾、水灾、虫灾、鳥灾、兽灾等。

旱灾：在反动統治的年代里旱灾非常严重，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老革命根据地的殘酷統治压迫的結果。反动派曾多次洗劫围攻革命人民，破坏生产，他們只知向人民要粮要税，而不重視生产，所以山区虽有較好的水利条件仍沒有得到利用，加之这里土質多系石灰岩，不易落水，于是旱灾几乎連年发生，尤其严重的是1940年的灾情，开春后沒有下过大雨，許多无法插秧，坡地作物全无收获，造成了遍地哀鳴，家破人亡的慘状。

水灾：这里于夏秋之交雨水較多，一遇暴风驟雨往往山洪暴发，酿成水患，俗語說：“易涨易退山溪水”，就是根据山区历来水患情况得出来的。

风灾：本乡是山区地带，地势很高，每于五、六月間，正当农作物茁壯成长时候，往往山风狂作，桐場里的玉米被吹倒，有时甚至民間的小茅房也被刮上天空，損失很大。解放后虽有气象預測报告預防，但仍是防不胜防的灾害。

雹灾：多在三月間发生，有时冰雹打来，作物幼苗被打死，甚至人畜亦受伤害。不过这种灾害在这里发生的比較少。

霜灾：一般多在秋后降落，越冬作物往往冻坏，为害也不少。

虫灾：主要有蝗虫、椿叶虫、鑽心虫等。解放前差不多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，据说1937年发生的那次虫灾最严重，到处田畝都有虫吃谷叶，农民每天早上去捕杀，一人就可得十斤，那年田禾有收的不到40%，損失极大。解放后，党和人民政府积极領導人民对虫灾作斗争，經常教育群众注意防治，一发现虫害馬上組織人馬扑杀，噴射杀虫剂，現在虫灾已逐步斂跡。

鳥灾：大致有大头鵝、谷雀、麻雀、烏鴉等种。大头鵝僮話称“六刁”，形似画眉鳥，个体稍大，每当玉米发芽长上地面时，它們成群結队飞来啄食，一下子就会啄光一坵地玉米，因此玉米发芽时多派人去看望防守；其他谷雀、麻雀等多是吃谷害鳥，偏远的田畝若无人看守往往被吃完谷子也不知道。这里防治害鳥的老办法，多是做假人立于田中恐吓，有时也組織人力去捕捉。

兽灾：为害最大的要算猴子，在山間桐場种的玉米、棉花、南瓜，到将成熟时往往被猴子摘光。野猪也常于晚間出来吃玉米、谷子、茄类等作物。过去人們亦常用粉枪去打猎，解放后更有了民兵打猎的組織，对消灭兽灾，保护庄稼起了很大作用。

(3) 生产关系及封建剝削

土地的占有：本乡有九戶地主，占有田地234亩多，占全乡土地总面积15.7%，富农二戶占有田地29.6亩。这些地主、富农階級都是通过巧取豪夺，明搶暗盜得来的。举个典型例子來說：地主黃松齡之家，在其祖父时还没有什么家財，但到了他的父亲，娶韦拔群烈士的姑母为妻，韦父过去是富有者，当黃母出嫁时带来了許多金錢財物，黃父則利用作投机生意，囤积居奇，賤买貴卖，凡是粮食、烟叶大批收囤，等到青黃不接时节，高价出售，通过物資吞吐而賺了大錢。右江革命失敗后，許多逃荒的农民回到故土，黃松齡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結，共同来压榨农民。黃还接受伪軍營长給他的一批錢，出入圩市赶馬獸做生意，发财后又买了田地，放高利貸，发了財成了地主。

从此以后，黄家就常利用权势，要农民为他作无偿劳动，每于春耕前，他就蒸糯米飯換家逐戶送給別人，假施仁义，誰接受了糯飯就得为他无偿的作春耕，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去，不得有誤。

地主黄松齡每年請四、五个长工，除給一些坏田种或一些年节米肉之类外，別无其他报酬，乡里的黄应华、黄松柏、黄林森、黄松立、黄松发、黄恩光、黄日甫等都为他做过无偿的长工，有些甚至几代下来都为他做奴。剥削之重，真是罕见。黄家地主每年出租的土地約80升谷种左右，好田他收三分之二租谷，坏田則对半分，佃农之家每还得无偿的为他服劳役十数天，过年过节又得給他送肥鸡肉类。他放的高利貸年利100%，一年不还利加利，迫得不少农户傾家蕩产。黄松齡地主戶的发家史充滿了血的罪恶。

租佃剥削：这里的地主有很多田，但出租的不多，主要是要农民为他们作无偿劳动，为他们耕田种地，偶然有出租的部份只是那些远田或坏田。这里出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榨取劳役地租，一是实物地租。一般負担劳役地租的多是以长工形式出現，地主請来了长工，給一些坏田种作为报酬，长工长年累月为他们耕作，除了得种些坏田以外別无所得。如貧农黄应华为地主黄松齡打长工，一年到头就只得一亩多田，过年过节得些米算了事，这种剥削是惨重的。实物地租下等田对分租，中等田地主得六农民得四，上等田地主得七农民得三，这种剥削更成了本地地主发财的普遍手段。

牛租的剥削形式很多，租一头牛来耕地只两个月就得納100斤租谷。有的地主牛多，拿小牛給人养，长大后生小牛，地主就收回母牛，留下小牛养大后，地主得四分之三，养者仅得四分之一。还有一种是养地主牛只得粪和耕犁之用，而地主还叫养者为他們做田工。

放猪花也是一种剥削手段，地主买来小猪給农民养，长大后除去本钱再对半分，地主从中得了利。

借貸剥削：在本地大致有几种。一是谷貸，利息60%以上，如陈灵在1948年5月向地主黄世鵬借谷子50斤，到10月得偿还80斤本利；韦品三在1947年因患病而借地主韦媽述合的谷子400斤，秋收还了250斤尚欠225斤谷本，到第二年秋收时得再还450斤；韦秉璐借地主50斤猪肉錢，到第二年要偿还100斤肉錢，剥削率达一倍；牙桂珍借地主40斤猪肉錢，以一亩田作抵押，到期不贖地主就耕抵押田，当年不計利息，若再拖延贖不了，則田就不得收回。地主利用借貸关系对农民的剥削是十分苛重的，許多人因此傾家蕩产，如陈永文家原有六亩田地，因借了地主韦松齡20斤猪肉錢一年半还不了，而被迫用田地押当頂債，到临解放前夕，已是一貧如洗，全家老幼均被迫給地主韦媽述合做工謀生，象这样由于受地主剥削而破产的人家，真是难以胜数。

一般來說，借債者大都是家貧无法生活，或是碰上天灾人祸、婚喪大事无法开支时才被迫借貸的，这里包括了貧雇农和一些下中农。他們成为地主阶级剥削的主要对象，而地主阶级剥削是他們貧困的社会根源。

土地买卖与典当：本乡山多地少，土地成为人們生活的重要依靠，也是历代祖宗遺產的重要部份，于是典卖土地便成为人們生活中不得已的事情。典卖土地产生的時間已不可考，直至解放初社会动盪不安的1950年，仍然有人卖买土地。土地卖买的手續与外地一样，都事先由中人通报，先族內后族外，先近亲后远戚，最后才到別人。当中保者通报后，經双方面議，看田定价，买方同意后，約定某日請中保人集中在当事人家中，宴飲一頓后，立契为凭，交清价款，手續就算完毕。今后买主如何利用耕种，与卖主全无相关。茲附典卖契約一文于下：

立契当田契字人黃家謀，住板勉屯，情因正用，迫不得已自將祖父遺下之田业，土名那花來供田壹块，出賣到同屯×××，买主親視田如意，应言承买，凭中作价上等猪肉柒拾斤正，当日田字两交清楚，此田定限为陆年滿期，准贖，卖主贖时即照上等猪肉价目贖回，若无者买主年年耕种管业。恐口无凭，特立此字为据。

在場人黃群謀 肉半斤

代字人黃福左 肉乙斤

民 国 叁 捌 年 (1949) 三 月 初 十 日 字

僱工：本地的僱工有日工和年工两种，剝削都很重，地主僱工一般是不給錢的，帮一天工只得吃一两餐飯，到秋后再給一两猪米；农忙时节，貧苦青年多去中和打工，一个月半个月不等，做一天工得工錢一斤猪肉。給地主商人做手工业的僱工，技术工（鉋烟）每天得工錢猪肉两斤，包装工則仅得吃两頓飯和一、二两烟絲，如黃金元、黃大发等都給地主黃松齡做过包装烟絲的短工，一个技工一天可包装烟絲六十斤左右，可換三古洋紗，可是仅得吃两頓飯和一、二斤肉了事，这种剝削是很残酷的。

年工俗称长工。本乡的地主都有长工，少的一两人，多則四、五人，如地主黃松齡每年都有四个长工，受僱者除得吃飯外，每年就耕地主一亩左右的土地作为报酬，过年节得些米、肉回家，这就是一年四季辛苦劳累的代价了。

超經濟剝削：这里的地主也往往利用政治势力及經濟力量，对农民进行超經濟的剝削。如每年春插之前，地主就假施慈悲，煮糯米飯包成若干小包（每包約一、二斤），挨家逐戶分送到农民家里，作为春耕定工的礼物，凡是吃过地主糯米飯的家，于春耕时就得去为地主做工，有叫必去，不得延誤，过去还有一种不合理的規例，每年插秧必須是地主先插，违者則被罰猪头祭鬼，否則庄稼就被地主强行毀損。这种規例，实际是为地主階級利益服务的地主階級的东西。

租地主的田地种的农户，每年也担受地主很多名目的超經濟剝削。大凡春节或中元节，佃戶都得給地主送鸡、鴨、猪肉或笋干、云耳等物品。如銅場黃松規的父亲租地主黃松齡三亩地种，除了年节照例送礼外，在1946年地主娶媳妇时，被迫送給一条40斤重的肉猪，原計劃作为換口粮的，猪送去后，生活困难只好以山薯野菜充飢。遭受地主階級类似情况剝夺的人不胜枚举。要是不依陋規送礼的农户，将受到夺佃的痛苦。

依于政治势力及經濟力量，地主与农民間发生的一些事情处理也是极不平的。农民的牛如吃了地主的禾苗，本来产量200斤則地主硬要賠償300斤，余下的仍为他們收，但农民被地主牛吃禾苗則很难叫他們賠償，如韦中先在解放前某年被地主黃松齡的牛吃了禾苗，叫他賠償不得反被借勢放牛吃光禾苗去。在这天下烏鴉一般的世界，又有誰来为农民講句公道話呢？！

（4）解放后农业生产的改变

減租退押：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，政治覺悟和思想覺悟空前提高，他們要求迅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。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，有步骤，有計劃的領導各族人民开展各項社会改革工作。从1951年上半年进行了減租退押运动。

本乡主要退押对象是黃松齡、黃世鵬、陈有祥、陈有举等地主富农階級。这些地富份子經過斗争算賬，共退出稻谷1482斤，还有人民幣和其他财产，全部退給被剝削的貧苦农民，解决他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。如那峨屯貧农黃应华由地主黃松齡家退得稻谷200斤，在地主黃世鵬处退得稻谷470斤；韦秉琚在地主陈有举处退得稻谷116斤，其他貧苦农民也取得

了数量不同的胜利果实。

减租退押运动的胜利，打击了剥削阶级，解决了部份人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和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，认识了贫困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，憎恨了封建剥削阶级，坚决拥护党的领导，加强了团结。

土地改革运动：本乡是1953年进行土改的。在土改前，本乡有地主9户（57人），富农2户（10人），中农56户（301人），贫农180户（961人），小土地出租者1户（1人）。

根据阶级分化情况，在运动过程中，培养了苦主，发动了群众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，斗垮了地主阶级，取得了伟大胜利。计取得的斗争果实有：耕牛37头。马8匹、农具96件（其中犁27把、铁耙21把、锄头镰刀48把）、田地235亩（当谷种16450斤）。所得的田地全部分给172户贫苦农民（人口860人）。

土改的伟大胜利，基本上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度，部份地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，改善了农民的生活。如贫农韦立福，全家5口人，土改前是个贫无立锥之地的入家，土改后分得田3.2亩，地1.7亩；贫农罗卜风，全家6口人，土改前无土地，土改后分得田2.1亩，地1.5亩；贫农黄应华，全家5人，土改前土地很少，终年给地主黄松龄做工，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，土改后分得田4亩，地3亩；雇农罗甫包含，全家无土地，靠打工、卖柴火、织草鞋等维持生活，土改后分得田2.4亩。所有这些贫苦农民在分得了土地后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，生产收入增加，生活有了改善，一些原来没有办法上学读书的贫雇农子弟得到了上学的机会。

互助合作运动：土改后为了消除两极分化，消除贫困，党领导了这里的僮族及其他兄弟民族，开展互助合作运动，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。1953年底至1954年初，本乡组织了三个互助组，即那烈一个组17户、东里一个组12户、勉屯一个组18户。互助组实行互助互利，互相帮助，在生产上发挥了不少优越性，吸引了广大农民，到1954年五月底，本乡所有农户都参加了互助组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。

随着互助组的建立发展同时，1954年5月，又在那烈屯建立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参加的农户21户97人。初级社实行评工计分多劳多得、土地分红等办法，比之于互助组具有更多的优越性，农民们更加向往了。在这个基础上，1955年初建成了五个初级社，1956年元月建成了全乡性的一个高级社。

高级社成立后，加强了领导，统一了组织安排，开展了组与组、队与队之间的劳动竞赛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。成立社后，耕作比过去细致了，肥料下的比过去多，计当年全社共积得绿肥8,000多担、草木灰20,000多担，岩泥1,000多担，庄稼生长得很好。

此外，高级社还有计划的改良土壤，变坏田为好田，变远田为近田，田地交叉的互相调拨，合理的利用劳动力，提高了工作效率，以插秧进度计，过去全乡插秧需30天，现在只要15天就完成了，工效提高了一倍以上。

经过种种措施，生产收入增加了。计1956年全社总收入粮食525,725斤，除去交公粮38,000斤，公积金18,629斤、公益金10,014斤、管理费5,000斤、生产投资13,602斤，种子26,300斤，其余分给社员，每个劳动日得三斤半。1957年总收入562,737斤，除去交公粮30,000斤、公积金15,290斤、种子25,000斤、公益金8,193斤、管理费3,746斤、生产投资10,000斤，其余以按劳取酬办法分给社员。许多社员增加了收入，象第三片黄润华过去不够吃，但高级社后收入增多，保证了吃饭，而且当年还卖了余粮450斤。其他收入增加的户数还有不少。

互助合作运动后农业生产的很快发展，与合作化的优越性有很大关系，国家的救济贷款也有很大作用。解放后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少数给予极大的关怀和照顾。1951年起就拨下了许多救济款；1953年国家给本乡贷款1,200元（新币）；1954年又贷给2,000元；1955年先后两次发下救济款198元，还有粮食贷款1,900元；1956年救济粮达4,500斤谷子，贷款1,300元买了锄头130把、镰刀80把，分发给贫苦人家解决困难；1957年拨给救济谷子7,002斤解决了91户生活困难，又拨给口粮贷款1,500元；1958年发给救济粮4,852.5斤谷子和生产资料购置费450元。这些救济和贷款，对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生产，解决生活困难具有重大意义。

二、手工业

本乡的手工业主要的有下列几种，现将其解放前后的变化情况写在下面：

木工：解放前本乡经营木工有勉屯4人、那立屯1人、板别屯1人，共约6人。其中每年外出搞木工达半年以上的有2人，以半工半农为生，其他4人多是在家，有工时则做木工，无工时则参加农业生产，没有与农业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手工艺。所有的木匠主要做的是抖犁、耙、桌子、板凳、织布机等工作，一把犁需要两天工夫（连找木料在内，下同），做耙则需三天，抖四方桌需工12天，抖织布机需半个月，工效很低。在他们六个人中，有四个人还兼搞建筑房屋木工，外村请去多是干这项工作，他们四人每次都是一起去，而以黄四尤为师傅，四个人起一间房子要40天工，每天师傅工资是两斤猪肉价，而徒弟仅为师傅的三分之一。他们所用的工具不很好，而技术水平也不太高，但在缺乏木工的山区里仍然是受到欢迎的。

解放后干木工的人增加到10人，合作化以后工作由社统一安排，并经常得参加学习，组织他们到别处参观、学习先进经验，思想觉悟与工作技术都有很大提高。大跃进中，他们解放了思想，创造了或仿造了象双铧犁、牛车、马车、手拔车、风箱、中耕机、切蔓机、打谷机等等的新式农具，大大拨进了生产的发展。

纺织：这里的傣族妇女很久以来就已掌握了纺纱织布的技术，直至解放前，差不多每家都有木制的纺纱机、织布机。每于农闲时节或夜晚，妇女大多是干织布工作，以为家人穿着所用。从整个工作程序来讲，棉花是自己种的，收下棉花晒干后，扎去棉籽，再请人弹松搓成棉条，然后拿回家，有空时纺成纱线，煮泡上浆，拉成经布，放上织机，再织成布，花费的劳动时间很大，每个人如果技术熟练者一天可织一丈多，要是差些则仅织得几尺。织成布后再以自种的蓝靛染制，方可用作裁剪缝衣。当然过去较为富裕的人家也有买回洋纱作为经织的，也有许多贫苦户没法织布而衣着无着的。解放以来，家庭纺织手工已日渐绝迹。这不是没有理由的，一方面大家有了土地，都投到农业生产上，增加了收入，改善了生活，而我们的商业工作对山区民族贸易也作的很好，各种机织布运到了山区，既漂亮又经济，比之于自纺自织自染的手工纺织来，节省了很多劳力与时间，于是许多人都到商店去购买机织布来穿着了。

铁工：四十年来，勉屯的黄毓光就是本乡独一无二的铁匠了。黄是本地人，从1925年起，他就开始在本地搞打铁工作，几十年来多是半农半工的，他在家开炉，有工做就在家打铁，无工做就参加农业生产。他的技术多是由外地学来的，诸如斧、锄、刀、凿、剪、耙齿等都会打制，技术一般过得去，工效也相当，如加工锄头，每天可打制五把左右，如是修理则增加一倍。估计在解放前每年有工140天左右，每天收入约1.8元，全年可收270元，除

此之外多是参加农业生产了。

1956年后，参加了农业社，由社统一安排組織修理农具工作。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，农具修配在今后仍需相应发展和扩大。

打石：1924年时，本乡板别屯有一个石工，名叫陈甫廖，后来不久他死了，石工已是后继无人，到1946年板拉屯黄应国才繼起石工工作。当时石工也还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，有工就外出打石，无工則在家中生产，收入仅占全年总收入10%左右。石工工具简单，石锤、石凿、銅棍就是主要工具，产品也很单纯，以石磨、石臼、石碑、石条为主，象雕花刻龙等细致复杂工作，他們还不掌握。解放后，本乡石工人数增加至14人，1956年組織他們入社，由社安排工作，采取分等記分办法付給报酬。1958年大跃进时，他們解放了思想，創造了新式連环磨，使玉米加工提高十多倍以上，节省了劳力。

烟：据说在1923年时候，本乡就有四个烟厂，即那峨屯的正昌、华昌两个烟号和勉屯的永昌、永业两个烟号。这四个烟号有的是地主阶级經營，有的是民間集伙成立。每个厂每天可生产80斤熟烟左右，供应本县及附近的田东、田阳、平果、河池、南丹、天峨、凤山、东兰等县需要，盈利很大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匪军的骚扰，四个厂曾一度停业，1936年以后，勉屯的地主黄善交、黄善初、罗瑞征和那峨屯地主黄松龄繼續开业經營，本地許多群众被吸收到厂中当工人，工資以猪肉价計，技术工人每天二斤肉錢，一般工人則一天一斤几两不等。地主阶级通过开烟厂赚了大錢，又轉投資于土地上，搶买土地，地主黄松龄的土地就有70%左右是靠开烟厂发财后买下的。解放后工厂归人民，1954年由乡和社掌握烟厂，請专业工人来搞，1958年以后，烟厂全部业务全是与商店訂貨加工熟烟。

榨油：解放前本乡有三个榨油作坊，主要是榨桐油。开榨油作坊的人不一定是地富之家，而普通群众亦可以組織股份开业。多年以来这里专营榨油作坊之人很少，他們多是在农闲时自由合股开业，每年开业時間仅有三个月左右，其他時間則是停歇。解放以后的1956年，农业合作社組織專人搞榨油，生产年年上升，1956年收入463.8元，1957年收入513元，1958年收入估計在700元以上。以每天生产数量計，四个工一天可生产250斤油。山区有丰富的油桐树，今后榨油工作定有更大的发展。

三、商 业

这里三个圩場，以中和圩較熱鬧，江平及兰木两个圩則較淡，都是三天一圩，赶圩的人大多数是僮族，少数是瑤族和汉族。据估計，解放前圩市很熱鬧，平时有200至300人赶圩，节日則达3,000左右，光猪肉每圩都有1,000斤以上交易，最多的达3,000斤（30至40只），盐巴每圩零售达3,000斤，商品經濟相当活跃，私商也不少，全乡共有40个小商贩，其中僮族占70%，汉族占16%，瑤族占14%，他們經常来往于田州、巴馬、柳州、南丹、河池、天峨、凤山等，販运貨物来往購銷，运人多是盐巴、洋紗、棉布和生活用具、生产工具等，运出的就是山区出产的桐油、茶油、米、烟、大豆之类，求得一日两餐的生活，可是，在这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社会里，小商贩也是很难保本的，不是被地主資本家排斥，就是因物价动盪而亏本的，还有地主高利貸者也常常向他們伸出剝削魔爪，如那峨屯黄宝昌自己没有本錢而向地主借錢做小販，地主不給現錢，而給熟烟去卖作为借款，本来每斤熟烟价8角而議借价为9角，提高了一角，而且还限定十天还本，否則就得按10%納月利，小商贩受剝削而实际是增加了农民的負担，吃亏仍然是广大农民群众。

在旧社会，本地由于各种原因所以农产品与商品价格差距是很大的，据調查所知，当时每斤生盐价格等于8斤大米的卖价，每斤棉线价值等于40斤大米卖价，农民們往往卖出大批农产品而买不了多少商品的。市場物价的动盪也严重影响了人們的生活。

解放后，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。1953年建立了国营貿易組一个，1954年又成立了供銷合作社，計有固定商販28戶28人（其中汉族2戶），其他則分別轉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业生产。在社会主义国营經濟的领导下，市場商品价格平穩，人民生活得到了保障。同时，各級商业部門还全面貫徹了“有賺有賠，不賺不賠，以賺补賠”的民族貿易方針，合理的供应商品和收購土特产，增加了各族人民的收入，人民購買力逐漸提高，社会商品購銷額日益上升，据統計1955年全乡商品零售額127,661元，1956年上升到205,692元，1957年达340,049元；1956年收購总值33,147元，1957年上升为45,028元。这些情况是旧社会所不可能有的現象。

在社会主义商业不断发展的同时，各族的商业工作干部也有了增加，計現有商业干部30人，其中僮族19人、汉族9人，瑤族2人，他們大部份人都誠誠懇懇、任劳任怨的为各族人民服务。

四、副 业

本地主要的副业有养猪、鸡、鴨、羊等，也有一些土特产。在旧社会，养猪对穷人来说是較困难的。許多人吃飯問題都无法解决，那里找粮食养猪？象勉屯的韦立福和那峨屯的黄家第等戶，从1926年直至1948年这二十多年間，完全沒养过一条猪，其他类似情况也有不少。而那些富家大戶，他們凭着有粮有錢有人工等条件，每年养猪十只八只那是常事，鸡鴨也不下50只。人們說“有米才养得猪”就是从这个情况来看的。

解放后，經過了土地改革，人們分到了土地，粮食收入增加了，生活安定了，养猪的戶数大增，鸡鴨数也加多了。如1950年統計，每戶均养有一、二只猪，1956年甚至增至六、七只的，鸡鴨二、三十只，收入很可觀。合作社集体副业也搞得不錯，1956年那烈乡农业社副业收入776.6元，1957年增至1,180元（包括土特产在內），1958年仅上半年就收入1,000多元，社員生活大有改善。

山区副业門路是很多的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今后仍将有更大发展。

五、林 业

山区山多地曠，林木葱郁，本应是林业重要地区，但在解放前，荒山野岭无人料理，每年三、四月間群众到处放火烧山，山林树木全被烧光，留下的松林仅約10,000株左右，其余的桐、茶油树也不多，群众起房子用材往往向西山区購買。

解放后，防火护林，封山育林工作已在这里搞起来，植树造林工作一年年发展。計1956年种桐果树1,406.7亩，茶油树543.9亩，茶辣树3亩，杉木111.9亩，松木96.24亩，其他树木30亩，合計2,658.54亩。各种树木长的很快，現在到处一片綠色，有些經濟林已陸續有了收益，如桐果每年約可收75,000斤，茶果12,000斤。各年收入总值，1956年457.83元，1957年1,760.90元，1958年收入4,630元。在山区林业生产有极大发展潜力，今后在发展山区經濟中是一个大头。